



重庆出版集团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

瞿林东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增订本)

瞿林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 瞿林东著—增订本.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29-11021-5

I. ①中… II. ①瞿…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
古代 IV. ①K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7999 号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

ZHONGGUO GUDAI SHIXUE PIPING ZONGHENG

瞿林东 著

责任编辑:杨 耘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2.5 字数:342千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021-5

定价: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导 论 / 1

- 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1
-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 6
-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 11
- 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 14

卷上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

——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 / 22

- 一、鸟瞰史学批评的历程 22
- 二、德、才、学、识 24
- 三、总结这一份史学遗产 26

直书与曲笔

——史家作史态度与“心术” / 28

- 一、“书法无隐”的传统 28
- 二、“直书”与“曲笔”的对立 30
- 三、对“心术”的探究 32

采撰的得失

——如何对待历史事实 / 36

- 一、采撰的得与失 36
- 二、“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 38
- 三、“指事说实”和“事得其实” 40

史法和史意

——从形式与内容的审视到思想的剖析 / 43

- 一、“史法”和“史意” 43
- 二、叶适的“史法”论及其史学批评 46
- 三、章学诚的“史意”论及其史学批评 48

天与人及天人之际

——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 / 51

- 一、“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51
- 二、“天道，不复系乎人事”，“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53
- 三、“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
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 56

人意·时势·事理

——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续） / 58

- 一、“人意”与“时势”的千年聚讼 58
- 二、“时势”与“事理” 60
- 三、“圣人之意”和“生人之意” 62

会通与断代

——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 / 64

- 一、马、班历史视野的歧异 64
- 二、刘知几对断代为史的推崇 66

三、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释	67
四、章学诚论“通史家风”	69

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

——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 / 71

一、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71
二、“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73
三、为史当重“经世之大略”，明“得失之枢机”	75

史学的审美

——史书的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 / 78

一、史学也讲究审美吗？	78
二、史书的“秩序之美”和结构之美	80
三、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	83

史论的艺术

——关于历史评论的评论 / 85

一、丰富的历史评论遗产	85
二、“精意深旨”与“笔势纵放”	86
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88
四、“于序事中寓论断”	90

心术与名教

——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 / 92

一、“直道”和“名教”	92
二、“心术”和“名教”	93
三、“名教”观念和史学发展	95

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

——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举例 / 99

- 一、三史是非和史学批评方法论99
- 二、“人恣”与“蔽真”100
- 三、“人臆”与“失真”102
- 四、“人谀”与“溢真”104

比较与批评

——兼说史学批评的活力 / 107

- 一、比较——一个古老的批评方法107
- 二、在比较中发展史学批评理论110
- 三、史学批评的活力112

时有古今 述有体要

——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 / 115

- 一、从马端临评论《通典》、《通鉴》说起115
- 二、王圻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评论117
- 三、客观“时势”和前人“苦心”118
- 四、“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119

素养·职责·成就

——史家批评论三题 / 122

- 一、史家的素养122
- 二、史家的职责124
- 三、史家的成就127

鉴识和探赜

——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 / 130

- 一、从“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说起130

二、误区种种	131
三、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	134

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

——关于批评的批评 / 137

一、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137
二、批评之批评的是非	139
三、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	142

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史学批评的不同视角和层次 / 145

一、史学家和史学批评	145
二、政治家和史学批评	147
三、思想家、教育家和史学批评	150

附论 中国史学发展概说

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 / 153

一、历史意识	153
二、史学意识	156

最初的步履 / 160

一、传说、官书和史诗	160
二、国史和《春秋》	163
三、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	165

成一家之言 / 167

一、秦与汉初历史思想的发展	167
二、《史记》的“成一家之言”	169

三、皇朝史的创立	171
 多途发展时期 / 174	
一、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	174
二、撰写皇朝史的高潮	175
三、地方史、家史、谱牒和别传	178
 发展中的重要转折 / 181	
一、官修史书成绩斐然	181
二、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183
三、典章制度史巨著的创立——《通典》	185
四、通史撰述的复兴趋势	186
 辉煌的时代 / 188	
一、《资治通鉴》和《通志》	188
二、三部当代史	191
三、历史文献学的多方面成就	192
四、辽、金史学的特点	193
 多民族史学的新发展 / 195	
一、《蒙古秘史》及其他	195
二、《文献通考》和《通鉴》胡注	197
三、元修辽、金、宋三朝正史	199
 走向社会深层 / 202	
一、方志与稗史	202
二、经济史撰述的繁富	204
三、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	206

总结与嬗变 / 209

- 一、历史批判精神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209
- 二、历史考证的辉煌成果211
-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213
- 四、清代官修史书的成就215

新旧更迭的开端 / 216

- 一、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216
- 二、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218
- 三、关于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局面220
- 四、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222

卷下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杂述

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 / 226

- 一、关于史论226
- 二、关于史评230

略说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 / 234

- 一、史学批评自觉意识的新发展234
- 二、怎样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238
- 三、怎样看待不同史书体裁的长短241
- 四、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诸因素的关系244
- 五、怎样看待史书的内容、形式及历史条件245
- 六、怎样看待不同类型史书的得失248

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 / 250

- 一、《府庠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250
- 二、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254

三、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	259
四、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	262
元代《通鉴》学和《通鉴》胡注 / 267	
一、元代《通鉴》学的发展	267
二、《通鉴》胡注的成就	269
影印《史学要义》序 / 273	
读《读史漫录》琐记 / 280	
一、“当天下大事”与才、量、识	280
二、读书要即事推见政俗	281
三、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282
四、元人修三史	284
五、“良臣”与“信史”	285
六、论史当忌“五失”	288
《读史纠谬》与历代正史 / 290	
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	291
二、关于史书体例和史家见识的批评	295
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	298
四、余论	301
说刘体仁《通鉴札记》史论的特点 / 304	
一、论治乱兴衰不落前人窠臼	305
二、论风俗纵观历代得失	309
三、论民族关注华夷交往	313

关于章学诚史学批评的一点批评 / 317

- 一、“唐宋至今”无“古人所为史学”?317
- 二、“史学所以经世”的传统是否中断?321
- 三、是前行, 还是回归?325

参考文献 / 331

后记 / 335

新版后记 / 338

校后赘语 / 341

导 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在史学理论上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是它的产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它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分别是宋元时期和明清（一八四〇年以前）时期，这是它的发展阶段和终结阶段。

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 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如《礼记·经解》所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比事”，是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属辞比事而不乱”，所谓“不乱”，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还包含了“属辞”中用例的思想。孔子修《春秋》，记二

百四十二年史事，在史事和时间的关系的处理上，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逐年编次。《春秋》以记鲁史为主，而包括周王朝及列国在这一时期的大事，这就要求汇集、编次同一段时间里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史事。这是“比事”中对史事和空间之关系的处理。“比事”，还有一层含义，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这就是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时期，史事头绪纷繁，《春秋》的比事在对史事处理、史书编撰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春秋》的“属辞”，首先也是有一定的体例上的要求。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入、战、围、救、取、执、溃、灭、败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的“属辞”，还有缀辑文辞上的要求，即对于言辞、文采的重视。孔子重视言辞、文采的运用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尤其重视对文辞的斟酌，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这反映了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左传》成公十四年）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这方面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里，可以看出人们很早就有了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到史学意识的产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至迟在西周晚年和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许多诸侯国都已经有了国史，这是当时贵族社会历史意识的反映。不过这些国史后来都失传了，我们很难推断当时人们在史学意识方面的情况。到了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这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还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

矣。”（《论语·八佾》）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讲授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无疑是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史学家和文献整理者，孔子的这个认识和他的学术实践，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第二，是孔子对于历史撰述在思想上的要求。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这里说的“义”，是褒贬之义，即是对于史事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趋势作出判断，显示出了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而从历史撰述上即从史学上明确提出“义”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人。

《左传》的史学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春秋》文辞的称赞。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大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作评论，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这是非常鲜明地在称颂齐国大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史学上乘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同《左传》的史学意识及有关的记载是密切相关的。

《左传》的史学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和对史官恪守职责、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说明古代史学批评从开始滋生之时起，便具有很高的境界。

比《左传》成书年代稍晚的《孟子》，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上文所引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

作”以及“事”、“文”、“义”的说法，是指出了政治形势和史书编写之间的联系，即涉及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指出了历史编撰所包含的事、文、义三个基本方面，并用孔子的话强调了“义”的重要。孟子关于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包含着史学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的认识，即认为《诗》代表一个时代，这就是“王者之迹”；《春秋》代表另一个时代，这就是齐桓、晋文之世。他概括了史书应当包含事、文、义三个方面，而又不把它们作同等的看待，突出了“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史学上的三个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的这些见解，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重要的。孟子在史学方面的见解，还突出反映在他明确地提出了有关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还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段话，包含的思想很丰富，一是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社会环境；二是从“孔子惧，作《春秋》”，看出了史家撰史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三是指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即“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关于史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也有深刻的影响。

先秦时期，从《春秋》和孔子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言论中，大致可以看到人们的史学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二）重视史家对于史事的评价；（三）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四）提出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五）关于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六）提出了事、文、义史学上的三个范畴，等等。这些，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古代史家的历史意识更进一步增强了。司马谈临终前同其子司马迁那一番激动人心的谈话，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生动写照。不仅如此，《史记》一书还洋溢着司马迁的一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是先秦时期的史家、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层次的史学意识。所谓史学

发展意识，它不只是涉及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极为看重史学是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字千钧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

“小子何敢让焉”，这是把“绍明世”、“继《春秋》”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可见，所谓“继《春秋》”，确乎是神圣的事业。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又强烈。司马迁的这种史学发展意识产生了伟大的成果，即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上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而且也是指“史家”说的。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史记放绝”，司马迁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要使历史撰述也成为一“家”。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从孔子到司马迁，古代史家的史学意识不断滋生、发展，提出了许多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中国史学走完了它的童年时代开始成熟起来，史学理论的产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标志。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6页。